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林克武同志的帮助，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本小册子，初稿是用四个月时间编写的，以后又作了一次修改，部分是多次修改。时间很紧，仓促编成，缺漏错误，固不待说，我们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莫乃群

1978.12.12

（此处为模糊不清的正文内容，疑似为前言或目录部分）

前 言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号召发展我国科学文化，今年又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新的形势和任务，都令人精神振奋，勇往向前，因此，我们虽自知马列主义水平很低，历史知识贫乏，但有满腔热情，总觉得应该敢于去做一些以前没有做过的事，便尝试编写这本《广西地方简史》，作为对壮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的献礼，这礼品虽然太微薄了，但是我们献出的一片热情和心愿，相信是会得到大家理解的。

这本小册子，主要是搜集有关广西地方的史料，稍加整理，使略有次序，便于参考。除辛亥革命和先秦部分这二章之外，在方法上，都按历史朝代的顺序，编列事实。我们采取编年史的方法，是为了工作方便。另外附有广西历代地理沿革简表，广西历代大事简表，广西历代人物简表，目的是对读者提供翻阅时的方便。自古以来广西就是多民族居住的地方，但史书关于各民族名称的记载很笼统也很混乱，现在已有广西《壮族简史》和其它各民族简史，介绍广西各民族的历史情况，因此，在这本小册子里，我们就不作详考了。

这本小册子参加编写的有宋光翎、吴天佑、谢逸华、郑谦、诸葛嵩、陆启琮、金石声、吴克清、韦瑞霖、李微各位同志。

广西地方简史

目 录

前 言

- 一、旧石器时代——战国时代（约五万年前——公元前二二二年）……………（2）
- 二、秦汉时代（公元前二二一年——公元二二〇年）……………（6）
- 三、三国（吴）晋、南朝（宋、齐、梁、陈）时代（公元二二〇——五八九年）……………（11）
- 四、隋、唐、五代十国时代（公元五八一——九七九年）……………（15）
- 五、宋、元时代（公元九六〇——一三六八年）……………（26）
- 六、明代（公元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37）
- 七、清代前期（公元一六四四——一八四〇年）……………（44）
- 八、清代后期（公元一八四〇年——一九一一年）…（50）
- 九、辛亥革命在广西……………（64）

附录： 1、广西地理沿革简表

2、广西历代大事简表

3、广西历代人物简表

广 西 地 方 简 史

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壮、汉、瑶、苗、侗、仫佬、毛难、回、京、彝、水、仡佬等十多个民族，壮族约一千一百多万人。在我国少数民族中，壮族是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壮族人民绝大多数居住在广西，一九五八年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今年是二十周年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西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十分珍视和坚持这个真理，并且在实践上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今天的中国是从昨天的中国来的，在我国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广西各族人民从事劳动生产、阶级斗争和文化活动，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创造历史，缔造我们伟大的祖国。这里，我们提供一些史料，对广西地方的历史情况试作简要的介绍。

一、旧石器时代——战国时代

(约五万年前——公元前二二二年)

恩格斯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解放以来，由于考古工作的发展，我区考古工作者于一九五八年，在柳江县新兴农场通天岩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和一九五六年来宾出土的“麒麟山人”头骨和部分肢骨化石，以及同时期的文化遗物。说明大约五万年至一万年前，广西已有人类居住，并创造和发展了广西地区的原始文化。

“柳江人”比“丁村人”、“河套人”进步，比“山顶洞人”、“资阳人”原始，体质特征和现代人基本一样。“柳江人”遗址中还有大熊猫、箭猪、中国犀、剑齿象、巨獭等的骨骼和牙齿化石。同一时期的文化遗物有柳江县陈家岩、思多洞，柳州市郊的白莲洞和崇左县矮洞，都安县干淹岩，百色上宋村，来宾麒麟山盖头洞等处出土有一批砍砸器、刮削器、石片等，这些粗糙的打制石器，是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说明人类在长期的劳动生产实践中，逐渐懂得制造一些简单工具，生产活动已由采集发展到渔猎，以后由于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发展，人类就逐步进入新石器时代。

大约一万年前，我区各地出土文物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以南宁豹子头贝丘遗址为代表，据C14测定为距今一〇七二〇±二六〇年，有两米厚左右的螺、贝壳文化堆积层，还有包括鹿、猪、牛、鱼类、象等的破碎骨头和牙齿，有经过磨制的石砬、石斧、石杵、石锤、骨椎、骨笄、骨针、

骨匕、骨镞、蚌刀、蚌网坠等。桂林甑皮岩出土的生产工具，有砍砸器、石斧、石磷、石环、石杵、石厉石、骨鱼镖、骨钳等。横县西津出土有骨鱼钩、石网坠、骨镞等。石器已成为他们当时主要的生产工具，他们已知结网捕鱼，张弓狩猎，陶器作为他们盛藏食物或煮食物的用器，说明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以采集和渔猎为主，同时出现了原始农业。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据C14测定，年代为距今七五八〇±四一〇年，人骨鉴定为蒙古人种）出土的人骨葬式，以蹲葬为主，也有侧身葬、二次葬，他们多属集体合葬，而无陪葬品，反映氏族内部的血缘关系，氏族成员无贫富及阶级差别。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区以扶绥、隆安的丘陵遗址为代表，有成堆的大型石铲、还有石斧、石犁等生产工具，这是当时农业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标志，有专门制作石器的手工场，此外还有石戈、石矛、石钺等武器，反映部落之间已有战争发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子在生产中的地位逐步提高。作为男性崇拜的“石祖”的发现，说明当时已由母系氏族公社转到父系氏族公社。

由于古人类在长期劳动生产中，逐步积累经验，懂得制造工具和改良工具，使生产力得到发展，也使社会生活发生变化，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于是原始社会解体，代之而起的是奴隶社会。

我国夏、商、周三代是奴隶社会，春秋战国时期则是奴隶社会趋于崩溃向着封建社会过渡。商、周王朝都和“百越”地区（包括现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发生了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逸周书·王会篇》提到“百越”部落向商王朝进献“仓吾翡翠”，“正南瓠、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玕、毒瑁、象齿、

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诗经·大雅》说周朝时，“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于疆于理至于南海。”一九七一年在我区恭城嘉会的一座春秋晚期墓葬中出土文物有三十余件青铜器，其中鼎、盂、钟、戈等都是中原来的。当时“百越”地区是什么社会状态，还未能充分说明，但恭城嘉会春秋晚期墓葬出土的钺、尊、剑等青铜器，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贺县出土的几何印纹陶釜、陶甗是本地方产品，北流县出土的云雷纹大铜鼓，体形巨大，纹饰精致；这都说明“百越”少数民族已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

但是，“百越”范围很广，不能一概而论。由于地理环境有差别，经济、文化状况有不同，各个民族也各有特点，所以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春秋时期，奴隶制已趋于崩溃，到战国时期（公元前四七五——前二二一年）则进入诸侯割据称雄、互相吞并的封建时代，当时冶铁业已相当发展，铁制武器和农具已相当普遍使用。战国中期，楚悼王用吴起变法，“南平‘百越’”，“楚南有洞庭、苍梧”，当时楚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力量已经达到现在的广西地区了。一九七四年我区在平乐银山岭，一九七七年在田东锅盖岭发掘一批战国晚期墓葬，出土有成套的铁凿，铁斧、铁铤、铁刮刀等农业生产工具和铁钺、铁矛、铜钺、铜剑、铜戈、铜矛、铜镞等兵器，还有铜鼎、铁足铜鼎等炊食器及花纹精致的铜鼓。这些器物有楚型制的，有本地方的，到了战国晚期，楚同“百越”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又有了更大的发展，而这种联系促进了各民族间互相交流和融合，也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左江沿岸一带有大量的崖壁画，是我区重要的古代文化遗产。其中，宁明县的花山崖壁画尤其规模巨大，气魄雄

伟，画象以人象为主，也有其他器物，如铜鼓、刀、剑等及各种动物的形象，表现盛大集会或欢乐歌舞的场面，是壮族古代文化艺术的杰作。

二、秦 汉 时 代

(公元前二二一——公元二二〇年)

战国时，各国当中以秦为最强。秦王（嬴政）于公元前二二三年灭楚，公元前二二一年灭齐，统一中国北方，号始皇帝。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一四年（始皇三十三年）派尉屠睢率领大军五十万人南攻百越（包括今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很快就平定了闽越地区，接着又平定了杨越地区，“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①，于是秦统一了全中国，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统一文字、车辆、度量衡和货币，建成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秦时桂林郡、象郡的一部分，在今广西境。桂林郡包括今桂林、柳州、梧州三地区及玉林地区东北部，河池地区东部、南宁地区北部。郡治布山县，在今桂平县境内、一说在贵县。象郡包括今百色、钦州两地区及玉林地区西南部、南宁地区东南西部、河池地区西部。郡治临尘县在今崇左境内，今越南北部一部分亦属象郡。

秦兵在进攻杨越时，久久不能取胜，因而增调大批援军，派监御史禄在今广西兴安县城附近开凿灵渠，以便运粮，解决了军需供应的问题。在取得军事胜利以后，又把军队驻防桂林、象、南海三郡，还迁移一部分中原人民到五岭以南，和南方各族人民杂处，促进了汉族和广西各兄弟民族

^①《史记》卷一一三《南越传》。

的融合。

由于秦朝修筑攀越五岭的道路，开凿灵渠，大大促进了黄河长江流域和南方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而大量移民，又把先进的文化技术传入南方，对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灵渠沟通了湘江漓江，成为南北交通的重要航道，不但在运输上节省了大批人力，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还灌溉了大量农田。以后历代都加以增修和利用，使工程更加完善，效益更加提高，对于广西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灵渠，从文化科学的成就来看，在二千一百多年之前已经达到如此高度，不能不令人惊叹。灵渠的设计思想，是把湘水南调，通过渠道，流进漓江，用以通航，横渡越城岭，它比“陆地行舟”巧妙得多了。灵渠的主要工程，是石堤和铤嘴，渠道和陡门（船闸）。史禄在湘江上游（兴安县城东南）建筑石堤（称为大天平和小天平），拦河蓄水，形成一个小水库，叫分水塘，在石堤中部又加筑一个突出部分，呈犁头形状，叫铤嘴，这样，石堤和铤嘴就起到储水、分水和溢洪的作用。又开凿南北两条渠道，总长三十多公里。铤嘴把湘水一分为二，流注南北两渠，北渠流入湘江，南渠经兴安县城流入大榕江（漓江上游）。在南渠设置若干陡门，用以蓄水，船只来往时，即把陡门打开，这样，从湘江南来或从漓江北去，都可以安然渡过越城岭。这样灵巧的工程，确实无愧灵渠的称号。当时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他们的聪明才智，至今还是光辉闪耀。

秦末，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纷纷起义。农民大起义的结果，秦至子婴而亡。公元前二〇六年刘邦称帝，国号叫汉。史称汉高祖。

秦末，南海郡尉任嚣病危，授意龙川令赵佗代理南海尉职务。任嚣死后，赵佗逐渐杀掉秦置的官吏，委派自己的亲信接替，树立自己的势力，其后又攻占桂林郡和象郡，于公元前一九六年（汉高祖十一年），自立为南越武王。当时，刘邦以天下初定，不宜用兵，于是派陆贾出使南越，封赵佗为南越王。文帝时，南越和西汉的关系也还密切。武帝时，南越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内讧，丞相吕嘉一派握有实力，坚持地方割据，不愿归附汉朝，杀死了汉朝派去的使节和南越王及王太后。元鼎五年（公元前一一二年），汉武帝分五路出兵南越，“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浚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皆将罪人，江、淮以南楼船十万人。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①。这五路只有路博德和杨仆的军队到达番禺，其他三路军队还没有到，次年冬，即平定南越，将原来南海、桂林、象三郡，分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其中苍梧、郁林、合浦三郡，在今广西境内。苍梧郡，有临贺、富川、荔浦、猛陵（今苍梧境内）、封阳（今贺县境内）等县，郡治广信（今苍梧境内）。郁林郡有阿林（今桂平境内）、中溜（今武宣境内）、潭中（今柳州市）、临尘、领方（今南宁市及邕宁县境）、增食（今宾阳境内）、安广（今横县境内）、广郁（今玉林县境内）等县，郡治布山（今桂平境内）。合浦郡有今钦州地区各县，郡治合浦，（其余各县在今雷州半岛）。南越称王达九十三年之久，“不用汉法”；对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

^①《资治通鉴》册二，卷二〇，页六六八

是不利的，至此归于统一，也就破除了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

汉武帝平南越之后，在一段时间内，还不改变南方民族的风俗习惯，也不征税。岭南地区，在汉朝三百多年间，经济、文化有很大发展。汉初，铁制农具已经输入南方，吕后时，曾加以禁止，对此，赵佗感到十分恼火，发兵攻击长沙边县，并指责吕后，说她：“近细士，信谗臣，异别蛮夷，出令曰：‘毋予蛮夷外越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①。由此可见，岭南各族人民对输入铁制农具和牛马是非常需要的，汉武帝统一南方后，解除了封锁，便于南方引进黄河、长江流域的生产技术。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件大事。由于国家统一，岭南地区得以使用牛耕和铁制农具，实现生产技术上的重大革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使农业发展达到了新的水平。到东汉建武十八年（公元四二年），光武帝派伏波将军马援出兵交趾郡时，命令：“长沙、合浦、交趾具车船，修道桥，通障谿，储粮谷，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讨之”^②，当时，长沙、合浦、交趾三郡要供应军队万余人用的粮食，可见农业生产已相当发展，要制造供应军队万余人用的车船，可见制造车船的手工业，也相当发展。马援从交趾回来的时候，沿途“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③，注意促进当时广西地区的农业发展。广西地区，西北可以通夜郎（今贵州、云南境）、巴蜀，北方可以通长沙、桂阳（今湖南境），东南可以通番禺，海路则通交趾，合浦是当时对外贸易的港口，交通和商业都有很大的发展。汉武帝常常派人从合浦出航，满载黄金、

①《汉书》卷九五《南粤传》

②《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

③《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

杂繒，到外国（东南亚各国）去购买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解放以来，我区各县出土的汉代文物，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状况，有的可与史书记载相印证，有的可补文献的缺略。如梧州、合浦出土的陶牛、陶牛车、滑石囤和铜仓（粮仓的模型）、反映当时农业生产上利用牛力，并有相当多的粮食需用仓库来贮存。贵县出土的陶灶及人物，是模拟生产情况的，灶前有火门，后有烟突，三眼各置一釜，旁置一缸，有五人操作，这是一种手工业作坊，反映当时利用农产品进行加工。还有铜鼓、铜钟、铜鼎、铜盘、铜灯、铜香薰、铜臼和杵、漆绘铜簞和铜盘、鍍金铜镜和铜俑、铜面具等等（贵县、合浦、梧州、西林等县出土），反映当时铸造各种铜器的手工业相当发展。合浦出土的琉璃、玛瑙、水晶、琥珀等各种佩饰品，说明当时合浦同国外贸易的事实。合浦出土的陶提桶有“九真府”字样，可见当时汉文化在九真郡已有相当发展，由此可以推知在交趾、日南两郡也应大体相似。

在民族关系上，到汉朝末期有了进一步的融合，例如公元一七〇年，郁林太守谷永说服了十多万兄弟民族乌浒人，建立了七个县，委任他们的首领担任官职，管理本地方的事情。

东汉时广西在文化方面也有很大发展，著名的学者有陈钦、陈元父子，是苍梧郡广信县人（在今苍梧县境），陈钦研究《左传》与同时的刘歆齐名。陈元“少传父业，为之训诂，锐精覃思”，光武帝时，“陈元与桓谭、杜林、郑兴俱为学者所宗”^①。

汉末，爆发了绿林、新市、赤眉、铜马、黄巾等农民大起义，汉朝终于灭亡，历史进入三国时代。

^①《后汉书》卷三六《陈元传》

三、三国（魏、蜀、吴）

晋、南朝（宋、齐、梁、陈）时代

（公元二二〇年——公元五八九年）

三国时代，今广西地区属孙吴的范围。早在公元二一〇年孙权派番阳太守步骘为交州刺史，率兵进入岭南，原交趾太守士燮和他的兄弟士壹（合浦太守）士贲（九真太守）士武（海南太守）等都表示拥护，士燮被任命为左将军，“由是岭南始服属于权”^①。吴建国后在今广西地区增设郡县，计有零陵郡的一部分（今全州、灌阳一带），始安郡（今桂林市、临桂、阳朔、永福、兴安一带），临贺郡（今贺县、富川、昭平一带），苍梧郡（今梧州市、苍梧、藤县、平南、岑溪、平乐、荔浦一带），桂林郡（今柳州地区一带），郁林郡（今玉林、南宁、河池地区一带），合浦北部都尉（今横县地），合浦郡（今钦州地区及博白、容县、北流一带）。另外，今桂西部分地方则属蜀国。

司马懿父子在魏经营数十年，到公元二六五年，司马炎称帝，废魏元帝（曹奂），国号叫晋，史称晋武帝。公元二八〇年（晋太康元年），派王浚率兵攻下金陵，吴末帝（孙皓）投降，吴亡，“于是沅湘以南，接于交、广，州郡皆望风送印绶”^②。于是晋统一了南方，在今广西境又增设郡县。

①《资治通鉴》卷六六。

②《纲鉴易知录》卷二九，页七五六。

公元三一八年，晋元帝分郁林郡置晋兴郡（郡治宣化在今南宁市境内），公元三六一年，晋穆帝分苍梧郡置永平郡（在今藤县境）。晋中期以后，北方各少数民族纷纷割据，晋王朝迁都金陵，史称东晋，于是南北分立，不断发生战争。在北方建立的政权叫北朝，在南方建立的政权叫南朝。

公元四二〇年，晋太尉刘裕废晋恭帝（司马德文）改国号叫宋，是南朝的第一个朝代。公元四七九年，肖道成废宋顺帝（刘准），改国号叫齐。公元五〇二年，肖衍废齐和帝（肖宝融），改国号叫梁。公元五五七年，陈霸先废梁敬帝（肖方智），改国号叫陈。宋、齐、梁、陈都在南方，建都金陵，故称南朝。南朝一六九年中，在今广西境的郡县，数目续有增加，名称亦有改变，宋增设南流郡（在今玉林县境），齐增设齐熙郡（在今玉林县境），到梁、陈时分设的郡很多，计新增十九个郡，即梁化郡（在今永福县境），黄水郡（在今罗城县境），马平郡（在今柳州市境），象郡（在今象州县境），韶阳郡（在今象州县境），静慰郡（在今昭平县境），武城郡（在今昭平县境），逍遥郡（在今昭平县境），开江郡（在今昭平县境），建陵郡（在今藤县境），阴石郡（在今容县境），石南郡（在今玉林县境），领方郡（在今宾阳、迁江、上林诸县境），桂平郡（在今桂平县境），安成郡（在今宾阳县境），简阳郡（在今横县境），乐阳郡（在今横县境），岭山郡（在今横县境）。这样，到陈时，在今广西境内所设的郡治比三国末年增加了四倍，但所辖的县只增加十一个。

增设郡县，实际是把行政区域划小，这从政治上，多派官吏，加强统治力量，当然，劳动人民受剥削的程度也加重了，从经济上看，则说明人口比过去大有增加，农业和手

工业的生产都有了发展，具备了增设郡县的条件。

晋武帝时封同姓王二十七个，异姓王侯按五等爵号分封，竟多达五百余个，其中以在广西的郡、县作为封地的有公、侯、伯三级，计共十处。凡分封都是世袭制，有领地，有官员，公侯级的还有军兵，有些被封的官僚，仍住在京城做官，但其封地则必须缴纳贡赋。宋、齐、梁、陈各朝都沿袭分封制，封在广西的王公均续有增加。

各朝代在广西境设置的郡县，多在东部地区，而以沿河两岸交通便利之处最为密集。郡县的行政权力，只能管理到城镇和近区，而对于广大的乡村还是管不到的。公元二八〇年交州刺史陶璜上书给晋武帝说，广州南境周旋六千余里，而服徭役的民户只有五千余家，不服徭役的却有六万余户。可见当时的统治力量仍很薄弱。晋太康时在全国户口作了一次统计，在广西的六个郡，只有二万五千多户。

自东汉末期以来，中原士族纷纷迁移到南方避乱，来广西定居的陆续增加，据《三国志·吴书》的记载，当时的交趾太守士燮一家，自汉桓帝时迁到广信（今苍梧县境）居住，到他已是第七代，士燮的兄弟辈有四人做郡太守，很有权势，因此，中原士人到他那里避难的数以百计^①。从三国到南朝三百七十年间，南方比较稳定，中原南迁的人口也不断增加，对于传播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起了有益的作用。

广西地区经济、文化状况难以详考，但根据史书记载的零碎的史料、出土文物和旁证，可以略知一二。

三国时，士燮每年遣使送贡物给孙权，除珠宝、水果之外，其中“杂香细葛，辄以千数”，士燮的弟弟士壹送一次

^①《三国志》卷四九《吴书：士燮传》

马“凡数百匹”，可见纺织业和畜牧都有发展。解放以来，梧州、贵县、恭城各地出土文物，三国时期的铜鼓，有鸟、兽、虫、花等纹饰。有一面铜镜，内缘浮雕人物及蟠龙纹，还有篆书反体铭文三十七字，是“黄龙元年”（公元二二九年）铸造的，刻工细致，色泽光亮，可以看到铸造的工艺水平相当高。三国、晋、六朝的青瓷器为数不少，釉色光亮，造型美观，可见制磁工业和技术亦有很大发展。此外，还可以根据一些旁证加以推论，如东晋初年，著名炼钢地区会稽郡的民众因避重役从海道逃到广州，把冶钢技术带到了南方，广州刺史邓嶽大开鼓铸，当然也会传到广西地区。又如南朝梁已经用钢制造刀铲，据《重修政和证类本草》铁精条下引陶隐居（陶弘景）的话：“钢铁是杂炼生（生铁）铄（熟铁）作刀铲者”，这种先进技术，当时也可能传到广西地区。